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伟

人

一

白

志

孙中山

宋庆龄

李光耀

尼克松

曼德拉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999

88157
41140

伟 人 百 传

第 六 卷

主编：侯书雄

曼
德
拉

尼
克
松

李
光
耀

宋
庆
龄

孙
中
山

远 方 出 版 社

目 录

孙中山	(1)
少年中山 一心报国	(1)
顺天行道 民主革命	(10)
创建民国 确立体制	(23)
捍卫共和 义无反顾	(40)
联俄联共 奠定基础	(58)
宋庆龄	(88)
冲破阻力 孙宋联姻	(88)
继承遗训 递境奋进	(102)
一心救国 不畏风险	(139)
文革岁月 高风亮节	(159)
李光耀	(175)
蜚声世界的华人政治家	(175)
创造经济奇迹	(191)
沿用和修改英国的司法制度	(207)
严于执法	(208)
重视廉政, 以身作则	(210)
尼克松	(240)
复杂家世 艰辛童年	(240)
跻身政坛 显露才华	(245)
卷土重来 入主白宫	(256)
权力巅峰 艰难施政	(260)
卷入“水门” 葬送前程	(268)
告别白宫 著书问政	(275)
曼德拉	(281)
独闯约翰内斯堡	(283)

翻开生命中的新一页	(287)
给非国大充电	(293)
南非第一家黑人律师事务所	(297)
自由之路无坦途	(303)
自由宪章	(309)
只为自由故	(311)
初试锋芒	(315)
金风玉露一相逢	(320)
黑云压城城欲摧	(321)
舌战“群儒”	(323)

孙中山

少年中山 一心报国

贫家之子

孙中山的故乡在广东南部的香山县（今中山市）。

唐宋以来，地处岭南的这个省份开始以“富而通”著称。但是，他于1866年冬出生于兹的翠亨却不富饶。仅有70余户的村庄的大部分居民生计艰难，耕地多为地主、官僚占有并实行残酷的地租剥削。苛捐杂税，更是纷至沓来。他出世时，家境十分贫困。虽然，他的先祖据说是中原望族。他的父亲孙达成曾在澳门当过鞋匠，后返乡租田耕作并兼更夫。他还有兄弟姐妹五人（两人早殇），全家居住在村边一间平房里。从6岁起，他就参加辅助性的农家劳动：随着姐姐到村外的金槟榔山割草打柴、去塘边捞取水生饲料“塘飘”和放牛，偶尔还同外祖父划艇出海取蚝。年龄稍长，便协助父亲下田操作。他很少有鞋子穿。番薯成为经常的主食。困苦的生活在童稚的心灵上留下深深的烙印，他后来曾自称“我是苦力，同时也是一个苦力的儿子。我生于穷人家庭，我自己仍然是穷人”。幼年的孙文认为“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此困苦下去。中国的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贫困的农家子弟的遭际使他“早知稼穡之艰难”，而他后来倡导民生主义则与“受幼时境遇之刺激”有关。

在香山的民众中蕴涵着可歌可泣的革命传统。农民和水上居民在

有清一代掀起的抗争此伏彼起。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民族英雄林则徐驻节县城，壮烈捐躯的水师提督关天培在香山辖属的磨刀洋面迎击过英国侵略军，广大群众的保家卫国的英雄事迹更是广泛流传。当然，给孙中山以深刻影响的莫过于刚刚覆败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他时常坐在门外大榕树下倾听太平军老战士冯观爽的忆述，天国英烈们的壮举令他无限仰慕，热望“洪秀全灭了清朝”，深为这场轰轰烈烈的反清斗争的悲剧结局而惋叹。深植于人民中的反侵略、反压榨的战斗精神哺育了他，致使他不止一次地赞扬故乡“不在地形之便利，而在人民进取性之坚强；不在物质之进步，而在人民爱国心之勇猛”。

困苦的生活并未压倒这个聪明活泼的孩子，孙中山陶醉于自己的意趣：游泳、捉鱼、捕蟋蟀、抓雏鸟、放风筝、踢毽子、跳田鸡、劈甘蔗，样样喜爱。还常去附近的武馆观看三合会员习练武术，或和小伙伴们在山野间模拟太平军同清军作战。“石头仔”——人们给他起了这样一个可爱的绰号，直到10岁，他才正式入乡塾读书。他热衷于学习，为了节省灯油而在月光下阅读。但对一味背诵儒家典籍颇为不满，曾向塾师要求讲解“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的涵义。随着观察和思考能力的逐步提高，周围的封建陋习引起他的反感。他厌恶赌博、蓄婢、纳妾，反对家人给姐姐缠足。由于劝阻赌博遭到殴打，又为诘责专横的胥吏险被刺伤。他还提出和思考过关于天地生死等哲理性问题，却是无从索解。他也曾渴望获取一只美丽善鸣的鸟雀，似乎这个未能实现的意愿会给他的童年带来光彩和幸福。社会生活的愚昧、窒闷和苦难，引发了好学多思的孩子的困惑、痛苦和莫名的企盼。

走出山村

孙中山越来越发强烈地憧憬着新的世界，甚至愿意离乡背井——虽然水碧沙明的兰溪和草木苍翠的金槟榔山长系心头，并在后来长期漂泊异域时化为浓郁的乡愁。他终未能一睹镇上牧师所藏有的那幅世界地图，但外部的信息不断传来。香山自来便是侨乡，生计迫使许多

居民前往澳门、香港地区和外国。他的两个叔父客死他乡，长兄孙眉在 19 世纪 70 年代初就随母舅漂洋过海，到夏威夷——华人称之为檀香山——去做佣工。当地兴发着的制糖业迫切需要劳动力去垦殖，孙眉经过 10 余年的劳作经营，逐渐上升为拥有牧场和商店的华侨企业家。孙中山从返乡完婚和招募移民的兄长口中得悉了许多檀岛的风土人情，对太平洋中那个“草经冬而不枯，花非春而亦放”的群岛心向往之。几经向家人恳求后，他在 12 岁时终于踏上泊在澳门码头的英轮，经历了 20 余个昼夜的航程，抵达了万顷碧波环抱的美丽的夏威夷。初次远行大大开阔了他的眼界，给予他许多鲜明的印象和感受：“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

孙中山从此留居檀岛，长达 5 年。一度在孙眉的商店中习练珠算、记账和当地的奈楷奈方言，旋即进入英国基督教监理会在火奴鲁鲁创办的意奥兰尼学校。他在这所用英语授课的学校教室中默坐了 10 天，然后开始学习字母、拼音和造句以克服语言的难关。待到 3 年后毕业时，这名各科成绩良好的学生竟然以英文法考试第二名获得了国王的奖励。1882 年秋，他升入著名的高级中学——美国基督教纲慎纪会主办的奥阿厚书院。原拟毕业后赴美深造，却因宗教信仰问题——他还在意奥兰尼学校时就准备受洗——而被孙眉敦促于翌年返乡。

檀岛的学校生活是孙中山接受“欧洲式教育”的发端，初步接触到的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使他耳目一新。尽管意奥兰尼学校创办人韦礼士主教确认这名中国少年在校时并未表露出明显的政治观念，但他的社会意识业已萌发。除了西学的启蒙作用外，现实生活促使他思索许多问题。他为脑后的辫子受到同学的嘲弄而深感痛苦，却坚持“中国人都可剪辫的时候才把辫剪掉”，因为“发辫不过是中国所受许多耻辱的一种，我们应该立刻把许多耻辱全体去掉的”。当地人民反抗美国的侵袭和架拉鸠国王的统治，给予他的开始形成中的政治见解以很大影响。

孙中山于 1883 年夏辍学回国。

少年时代已经逝去。青春年华伴同他返回祖国。开阔的视野，新

的知识和观感，变革社会的热忱，“神圣的权力不是永恒的”信念……使他对睽别五载的故土感到陌生，而在心灵深处则糅杂着伤痛、忧虑和愤懑的情愫。他从香港换乘返乡的沙船，初入国门便受到清吏的多次扣留勒索，他不禁向旅客们疾呼：“中国在这些腐败万恶的官吏掌握中，你们还坐视不救吗？”回到梦魂萦绕的翠亨后，他一度留居家园——这是亲人们的意愿——参加耕作和继续自修。但是，封建专制主义君临下的黑暗和愚昧，令他深感窒闷和厌憎，他在一些场合抨击官府的弊端，希冀采取修筑道路、防御盗贼等改良乡政的措施。同村的青年陆皓东、杨鹤龄与他过从甚密，他们常在一起读书和议论时政。陆皓东曾经顶替虚额参加本县团防检阅，十分惊异于兵勇竟多由烟民、乞丐充当。他们从这种腐朽的现象得出论断：只需数十名健儿，便可袭取虎门炮台；疲塌的清朝兵勇，完全不堪一击。

乡居生活并不长久，他们的反封建迷信活动酿成轩然大波。孙中山还在檀岛时就已反对崇奉关帝之类的偶像，翠亨乡民膜拜北帝庙中的木雕泥塑益发使他反感。“劝勿妄信”没有效果，他便和陆皓东进入庙堂把北帝手掌的直竖的中指折断，又将左廊金花殿内的娘娘塑像的脸蛋用指甲划成花面，还对北帝大加申斥。笃信神灵的村民颇为惊恐和愤怒，把亵渎神像者视为“疯孩子”。他的父亲只得应允修复神像，他则被迫前往香港。意味深长的是：他在进入英国基督教圣公会主办的拔萃书室后不久就与陆皓东受洗为基督教徒。真正使他后来摒除各种宗教观念的主要因素还是科学：“余于耶稣教之信心，随研究科学而薄弱。……颇感耶稣教之不合论理，因不安于心，遂翻阅哲学书籍。当时余之所心，大倾向于进化论。”在后来的日子里，他的战友甚至“永不见其至教堂一步”。

就在孙中山赴港求学的那一年，爆发了中法战争。从英国于1840年挑起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资本—帝国主义采用包括暴力在内的各种手段推行殖民掠夺政策，并同封建统治者相互勾结，使封建的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这个屈辱悲惨的分解过程中，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此伏彼起。持续达10余年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则是革命浪潮的高峰。随着70年代民族资本主义的萌发，

剧变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思想领域中出现了——外铄的作用当然是巨大的——更多的新因素。维新人士开始比较系统地引进新学，积极传播社会变革观念。法国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加深了民族危机，进一步暴露了清朝政府的腐败，激起了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推动了维新思潮的扩展。民族意识的昂扬给予满怀爱国与变革热忱的青年孙文以“希望和勇气”，香港工人拒绝修理法舰和装卸法货的正义行动使他受到启示和激励。他认为这一切“证明中国人已有相当觉悟”，因此，“战胜法国并非难事，只靠民众力量。”当然还“应当造钢铁的船，木头船是没用的”。他更加认真地考察和剖析日益朽败的清帝国，特别注目于它的军事体制和装备。否定现存政权的概念潜滋暗长，他曾向檀岛的朋友表示：一俟学有所成后，“就要准备推翻满清。”后来，他十分强调这桩事件的重大影响：“余自乙酉中法战后，始有志于革命。”

从1884年春到1886年夏，孙中山就读于港英当局主办的中央书院。由于阅读中文书刊存在困难，便于课外努力补习国学。他的好学习与博识，使他获得了“通天晓”的绰号。在校期间，曾应孙眉的函召再赴檀岛，为损毁神像和受洗入基督教事受到责备，并退还了先前分给他的财产。

1885年夏，他又返乡与同邑外壠村卢慕贞结缡。

当他在书院修毕中学课程后，这名双十年华的毕业生面临着生活的抉择。捐官、投考神学院等路途铺在他的脚下；学习军事和法律则是他的志向；祖国落后的医疗卫生状况——特别是中法战争中暴露出救护工作的严重缺陷，引起了他的关注。他终于选择了医学：“以医亦救人之术也。”经由为他施洗的美国教士喜嘉里的介绍，他进入广州博济医院附设的南华医学校。在校期间不过年余，留给周围人们以深刻的印象是他对教学中“不合理制度”的改革主张。他要求男生参加产科实习，并使校方采纳了这个破除封建观念的建议。他结识了同学郑士良和广州算学馆的学生尤列，经常议论“维新兴国”的有关问题。郑士良与会党保有密切关系，他正是通过这位同窗的中介接触了中国的秘密会社。

孙中山于1887年转入香港伦敦传道会和香港议政局议员、维新人士何启创办的西医书院，因为该校“学课较优，而地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这所书院采用英国医科大学学制，颇为注重实习，他在5个学年中研习了物理学、化学、植物学、解剖学和药理学等学科，获得优秀成绩。全部课程12门中有10门被评为“H”（80分以上的荣誉成绩），仅有两门为“P”（合格）。从二年级起，连续4年名列第一。然而，他并不满足于医学专业知识。达尔文——他刚刚逝世——的进化论令他心折。法国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史使他昂扬。他还“研究国际法、军事学、海军建设、各种财政学、国政、各种派别的政治学”，并把“通晓舆图”作为“实学要旨”，时常审视悬于壁上的中国地图，慨叹“如此江山，付之非人”。他很喜欢中夜起床阅读国学典籍，探究“历朝制度之沿革”和“古今治乱之道”。勤奋的医科学生在港英政府统治下的香港高等院校中大体完成了“欧洲式的教育”，这种学习的机遇在同代人中是罕有的。

孙中山更为热切地关注国事，经常同郑士良、尤列及稍后结识的同学陈少白到校舍附近杨鹤龄家的商店杨耀记聚会。热情洋溢的年轻人踏着陡峭的石阶，走过狭窄阴暗的街道，“昕夕往还，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他又以洪秀全自况，提出“勿敬朝廷”的口号。“无所忌憚”的言论惊世骇俗，致使他与陈少白、尤列、杨鹤龄获得了“四大寇”的头衔。这是他自称的“革命言论之时代”，虽然当时还未广泛使用“革命”这个名词。另一方面与激进的观念并存的则是温和的维新思想。他在1890年前后写信给退休乡居的同邑郑藻如（曾任职海关道和出使欧美），提出改革主张三点：兴办农会以倡导农桑，立会设局以杜绝鸦片，创置学会、学校以普及教育。后来刊载于澳门报纸的《致郑藻如书》具有进步的意义，其内容则为维新思潮的通论。事实上，他也与一些维新人士有着密切联系。他同居留沪上的郑观应商讨“改革时政”，后者曾在风靡一时的《盛世危言》中称道过“吾邑孙翠溪西医”。他的教师何启也给他较大影响，这位留英学习医学和法律的维新人士的代表作即是流传广泛的《新政真诠》。仿效西方，变法

维新，对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封建专制主义君临的中国社会无疑是一种冲击，具有民主主义的启蒙意义。积极探索变革现实途径的热血青年受到维新思潮的浸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完全合乎逻辑的现象。

1892年秋，孙中山以优异成绩毕业。康德黎教务长向他颁发的医学士证书执照内称：“照得孙逸仙在本院肄业五年，医学各门，历经考验，于内外妇婴诸科，俱皆通晓，确堪行世。”然而，这名合格的医生却并不满足于自己的良好职业。与“救人之业”相较，他更热衷于医国的崇高使命。他确信“医术救人所济有限，其他慈善事业亦然。若夫最大权力者，无如政治。政治之势力，可为大善，亦能为大恶。吾国人民之艰苦，皆不良之政治为之。若欲救国救人，非锄去恶劣政府不可”。这种真知灼见抓住了改造社会的关键，他决心投身于政治斗争。在离港赴澳开业时，他曾在船上对陈少白“讲到将来有机会的时候，预备怎样造反”。

孙中山到澳门行医，是由于当地的一些绅商——他们或是孙眉、杨鹤龄的戚友，或是接受过他的效果颇佳的治疗——的邀请。作为澳门第一位华人西医，他在当地著名的镜湖医院悬壶：开诊是义务性质的，取得的补偿是院方借贷给他开设中西药局。他的医德和医术为人称道，外科更是闻名遐迩，康德黎博士间或从香港赶来，帮助他过去的学生实施较大的手术。他的医务颇为顺利，“就诊者户限为穿”。而他更积极开展社会活动，据说曾在澳门和翠亨试验过炸药——至今，他自行设计的故居附近的石牌坊的横额还留有一条裂痕。但是，他并未在澳门久留。那里缺乏政治活动的良好条件，他深感难于寻求志同道合者。加以还受到葡萄牙同行的排斥，先是禁止他为葡人诊治，又迫使药店对他的处方“不得为之配合”，致令医业“猝遭顿挫”。因此，他决定到广州去。

翌年春天，孙中山在省城西关著名的医药街道洗基设立东西药局，并于城内双门底圣教书楼开办医务分所，不久又在香山县城创置药局的分店。一则当时的药局广告大体勾勒了他的医务的轮廓：“每日十点钟到十二点钟在药局赠诊，不受分文，以惠贫乏。……午后出

外诊症。先生素以济人利物为心，若有意外与夫难产、服毒等症，报明危害，无论贫富，俱可立时邀至，设法施救。”他很快获得了人们的赞誉，“病家趋之若鹜”。繁忙的医务妨碍了社会活动，他被迫提高诊金。求医者依然众多，他的月入可达千元左右。

北上投书

孙中山以“医术”为入世之媒，越益热衷于政治活动：“行医日只一两时，而从事革命者实七八时。”丰盈的收入被大量挪用，药房渐有“不支之势”。他的周围团聚着许多志士，经常在基督教徒左斗山开设的销售西学译著的书店圣教书楼后面的礼堂和广雅书局内南园抗风轩集会，议论时政，探究途径。他和郑士良等积极“结纳会党，联络防营”，并同水师中的青年军官程璧光、程奎光等建立了密切关系。组建团体的课题业已提上日程，他和他的同志们甚至拟出了兴中会这个名称，宗旨则为“驱除鞑虏，恢复华夏”，只是由于参与人数过少等原因而未形成“具体的组织”。1894年初，他与陆皓东回到翠亨起草了《上李鸿章书》，又与由港来穗代他主持药局的陈少白反复推敲，决定北上投书。他认为当前的变革途径有二，即是中央革命和地方革命。《上李鸿章书》如能得到采纳，意味着自上而下的中枢变革。与自下而上地开展反清斗争的地方革命相较，易于奏效。这年春天，他与陆皓东携书登程，从此告别了医生的职业，成为职业政治家、革命家。

孙中山等在上海略事逗留，会见了郑观应和另一位著名的维新人士王韬，再次修改了《上李鸿章书》，并请他们为介于李鸿章的下属和幕僚。6月，他们抵达天津并通过李鸿章的幕僚递上了书函。显而易见，《上李鸿章书》较之《致郑藻如书》有了长足的发展。他指责了听任“关卡之滥征，胥吏之多弊”的封建苛政，批判了“徒坚船利炮之是务”的“舍本图末”的洋务派，确认“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当务之

急，则是“农政之兴”。变革将使贫弱的中国臻于富强：“以中国之人民才力，而能步武泰西，参行新法，其时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这种促进中国近代化——资本主义化的方案体现了历史的发展趋势，因而具有积极意义。选择李鸿章为上书对象也非偶然，他不仅是权倾一时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更以兴办洋务闻名于当世，且为西医书院的名誉赞助人。然而，李鸿章对来自粤东的投书者并未理会。他们奔走呼吁，不过领得一纸“农桑会出国筹款护照”。

《上李鸿章书》的内容全然属于维新思潮的范畴，所以被郑观应赞为“其说亦颇切近”。但是，作者不同于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式的维新派“君子”们。孙中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贫苦农民和华侨企业家的家庭中度过，且又受过“欧洲式的教育”，比较了解西方社会，精神世界中蕴涵着较为激进的民主主义因素。在他的心目中，古老的帝国和至尊的皇冠并未围绕着神圣的光环，否定现存社会秩序的造反行动，决非大逆不道。他是近代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的代表，较少承受因袭的重担。因此，当他意识到维新思潮的局限，加以激进的民主主义因素的增长，就必然在一定的机缘下跨出关键的一步，开拓了新的征程和局面，赋予近代中国民主革命以更为完全的意义。

顺天行道 民主革命

初次较量

毫无疑问，上书的失败给孙中山以很大的刺激。然而，此行决不是徒劳的。他具体而深刻地认识到李鸿章之流的贪婪，其“发财致富的方法之一，就是各级文武官员请求任命，必须支付大量的贿赂给李的随员”。北京给他留下了十分恶劣的印象：“则观满清政治下之齷齪，更百倍于广州。”加之中日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于10月攻陷了辽东半岛。极其严重的民族危机再次暴露了清朝政府的朽败，洋务运动面临彻底破产的命运。严酷的现实消除了他对统治集团中某些人物所抱的幻想，激发了他的革命意识——“知和平手段，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

由是，孙中山的思想历程达到了临界点。

这年10月，孙中山在日军轰击辽东的炮声中从上海乘船前往檀香山。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热望，充溢于他的心胸。为了尽快组建革命团体，他在侨胞中进行了紧张的宣传和鼓动。檀岛当时约有华侨两万人，主要为工人、职员、小业主和中小资本家。他们在异域的屈辱遭际，特别是美国政府在80年代煽起的排斥华工暴行，使他们失望和不满于清朝政府的庸懦无能，但其觉悟毕竟有限。他的活动终于获得了几十名拥护者，其中包括孙眉和另外一些亲友。11月下旬，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第一个团体——兴中会在火奴鲁鲁建立。在孙中山起草的“章程”中强烈谴责了清朝政府的罪行：“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同时，尖锐地指出了民族危机的空前深重，“蚕食鲸吞”、“瓜分豆剖”的厄运迫

在眉睫。“章程”规定兴中会的宗旨“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会员誓词则把奋斗目标概括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当首批会员举手宣誓入会时，一个划时代的民主革命政纲从此问世，革命民主派开始形成，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进入比较正规的阶段——虽然，誓词仅使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初具雏形，但是，它不愧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包括共和制度要求的政纲。

继火奴鲁鲁的兴中会建立后，茄荷蕾、百衣等地陆续建立分会。会员超过百人，力量初步形成。反清武装斗争立即提上日程，因为孙中山愈来愈重视革命暴力在社会变革中的重大作用。严酷的现实使他意识到温和的手段——例如上书——无能为力，必须诉之于“强迫”。然而，他不可能在水火阻隔的远方策划举义。在迅速筹得一笔不多的经费后，他即于1895年初回到香港，并在当地进步团体辅仁文社成员杨衢云等的参与、支持下很快建立起兴中会总机关，以便加强同国内的联系和就近组织武装起义。香港兴中会的人会誓词同于檀岛兴中会，“章程”中则加强了对清朝政府的揭露和谴责。

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决定在广州举义，然后把革命辐射向各地。他与郑士良、陆皓东等在省城建立了兴中会分会，先后设置机关据点数十处，广泛联络防营、水师、会党、绿林和游勇，并以农学会作为公开活动的旗号。他还取得了香港《德臣西报》和《士蔑西报》的英国记者的支持，又曾访问过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杨衢云等承担后勤任务，负责筹措经费和购运械弹。1895年秋天，起义的准备工作大体就绪，确定于重阳节发难，制定了攻取方略和讨满檄文、安民告示及对外宣言。在推举兴中会会长兼未来临时政府总统人选问题上曾经发生分歧，孙中山为避免分裂而将这个职务让与杨衢云。根据大多数骨干的意见，采取集合力量分路攻袭和策动清军内应的战斗方案。重阳前夕，义军大抵集中、隐蔽于珠江的艇上待命。杨衢云突然要求延期，因为承担突击重任的队伍不能按期赴穗。形势陡变，稽迟将会断送起义。孙中山果决地下令解散义军，同时电告杨衢云阻止队伍前来。然而，斗争计划已经泄露。港英政府早把革命党人运送武器的有关情报电告两广总督，变节分子又使内情为官府得悉。于是缇骑四

出，陆皓东等被捕。不及变更行程的两百余名义军在所乘港轮抵达省城码头时遭到围击，被俘 50 余人。起义流产，附近地区的响应迅即失败。革命党人在法庭和刑场上表现了英雄气概和牺牲精神，陆皓东义正词严地宣称：正是由于“愤政府之腐败专制”和“外人之阴谋窥伺”才高举义帜，“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但我可杀，而继我起者不可尽杀。”他与朱贵全等人从容就义，成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

在初次的武装反清斗争中，这位刚刚放下手术刀的青年革命家表现出异常的镇静。直到清军实行大搜捕的当晚，孙中山才乘小轮逃抵澳门，经由他的葡籍挚友飞南第的帮助转赴香港。鉴于这块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地盘不可久居，他稍事逗留后——港英政府旋即公布了驱逐令——即往日本。甫抵神户，当地报纸已披露“支那革命党孙文抵日”的消息。他十分赞赏革命两字，向同行的陈少白和郑士良指出这个词汇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所以今后“但言革命，勿言造反”。他在日本继续进行宣传和组织活动，建立了横滨兴中会，并且断发改装，以示同清朝政府彻底决裂。

流亡异域

长期的流亡生涯从此开始，孙中山决定走向世界去观察、思索和撒播“火种”。行程的第一站是檀香山，他在那里向关心国事的侨胞们讲述了广州起义的经过，又组织兴中会会员参加兵操，聘请丹麦人柏格——曾任中国南洋军队教习——担任训练。然而，初次的挫败使得各种活动“进行迟缓”。他于 1896 年初踏上了新大陆，自西徂东横越美国。他在旧金山建立了兴中会，又向各埠的洪门组织和侨胞反复“说以祖国危亡，清政府腐败，非以民族根本改革，无以救亡”。由于遭受排华迫害的侨胞竭力为生存而挣扎，加以“风气闭塞”，反应并不强烈，“其欢迎革命主义者，每埠不过数十人，或十余人而已”。流亡生活十分艰苦，他居留纽约时经常睡在一间书馆的地下，往往以一碗面条充饥，但却毫不在意。

孙中山于秋季从纽约乘船赴英，显然没有充分意识到行程中潜藏着荆棘与陷阱。他被清朝政府视为洪水猛兽，广东地方政府悬赏千两花红银缉拿这名“要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更是电令驻外使节严密侦察，相机拘捕。在他抵达伦敦之前，清驻英使馆业已获悉他的行踪。公使龚照瑗即派英籍参赞马凯尼向王国政府交涉逮捕、引渡事宜，同时雇用侦探加以监视。他们的要求遭到拒绝后，于是决意采取绑架手段。10月11日，当抵达伦敦已经10天的孙中山从旅舍前往康德黎博士——他们去岁在檀岛街头偶然相逢并相约于伦敦会面——的寓所途中，被预伏在清使馆附近的工作人员邓廷铿等拦阻纠缠，强行挟持入使馆内。他失去了自由和通讯的权利，窗口装有铁栅的房间实际上成为囚室。根据总理衙门的电示，清使馆准备雇用英轮秘密押解孙中山回国。他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向外界通报信息乃是惟一生路。孙中山曾采用把写有被囚简况的纸片裹以金币掷出等办法，却只招致更严密的防范。幸而他的遭遇获得清使馆内英籍佣工的同情，贺维和柯尔先后把孙中山的情况和亲笔短笺送给康德黎博士。康德黎博士立即同另一位西医书院的教师孟生博士展开营救活动：向警署和外交部报案；通过报纸揭露清使馆的卑劣行径；雇请侦探监视清使馆的动向。绑架真相被披露后，社会舆论对清使馆的行径予以强烈谴责。英国外交部指出清使馆的行为超出了应该享有的外交特权，以正式照会形式要求释放被囚禁者。22日，清使馆不得不恢复了孙中山的自由。当日下午，孙中山在康德黎博士的陪同下走出使馆，向给予声援的人们表示感谢。伦敦被难对于开始踏上民主革命征程的战士确是一次严峻的——“自分必死，无再生之望”——考验和磨砺，增强了他的信念和意志。同时，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了清朝政府的野蛮凶残。完全出乎迫害者意外的，则是这桩事件使年轻的革命家闻名于当世。英、美、日和港、澳的报刊纷纷登载有关消息，国内维新派主办的《时务报》也有所反映。许多评论称许孙中山为新型的“革命派领袖”，相信他会对中国的进步作出贡献。

孙中山留居伦敦直到翌年夏天，勤奋地读书、观察、思索和写作。他经常往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世界上许多杰出人物都曾在这